



西域美术全集

*Complete
The Works
of Serindia*

1



岩画卷

Rock Painting

主编 李星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新疆美术出版社



西域美术全集

*Complete
Art Works
of Serindia*

1

岩画卷

Rock Paintings

主编 李贵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新疆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域美术全集. 1, 岩画卷 / 李贵春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6 (2016. 11 重印)
ISBN 978-7-5305-7503-1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美术—作品综合集—新
疆—古代②岩画—作品集—新疆—古代 IV. ①J121
②K879.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56637号

西域美术全集 1 岩画卷

Xiyu Meishu Quanji 1 Yanhua Juan

出 版 人: 李毅峰
责 任 编 辑: 刘 欣 任 莹
技 术 编 辑: 李宝生
装 帧 设 计: 陈 彤
出 版 发 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 编: 300050
电 话: (022) 58352900
网 址: <http://www.tjr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21
印 数: 2001-3000
定 价: 5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书主编
执行主编

金维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谢继胜 浙江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李毅峰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于文胜 新疆文化出版社社长

总策划

杨惠东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杨东胜 北京东方博古文化公司董事长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琨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刘振 新疆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阮荣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孙大卫 新疆文化出版社原副社长
张鹏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陈聿东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周菁葆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侯世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
顾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莫合德尔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徐红 新疆大学教授
徐永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院长
涂苏别克 新疆日报社高级编辑



金维诺 谢继胜



图1 绿底对鸟对羊灯树纹锦

[1]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巴州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因此，“西域”的称呼“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耆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则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语在《西域传》。吉薨，谥曰缪侯。”《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2]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M]，向达，译，商务印书馆，2013。

一、古代西域、“丝绸之路”与早期佛教美术

古代西域，最初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南部。在汉武帝时，西域与内地发生联系的，已有三十六国，以后增加到五十多国。《汉书·西域传》记这一地区概况时说：“西域以孝武帝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1]这一地区南、西、北三面为昆仑、葱岭、天山诸大山脉所包围，中部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能居住的地方，仅是大山脉的坡地及沙漠间有水源的绿洲。从地图上看，这一大片地方就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一座障壁”。斯坦因称之为“亚洲腹地”，借以表明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2]当东、西文明兴盛之际，处于东、西文明之间的西域，在东传西渐的文明交往中，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点，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都在这里驻足，又与当地独有的文化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绿洲城郭文化。绿洲城郭依自然地势呈点状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城郭间既彼此独立又唇齿相依。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正是通过西域城郭间的点状连接来完成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依赖于这种独特的连接方式。

“丝绸之路”由长安出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后，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和北缘向西，分作南道和北道。南道沿南山（昆仑山）北坡西行，越过葱岭南部，可以通到大秦。北道沿北山（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可以到达奄蔡，再通到大秦。中国以丝织物为主的大批物资，通过南北两道运销西方各国。大秦的毛织品，奄蔡、严国的皮毛也由此东来，运销中亚及中国内地。西域不仅从物资交流上连通着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也相互传播，联系着东方和西方。汉族文化流进西域，通过西域而又西传。西方文化也逐渐传入西域，以后又东传进入西域“丝路”，流入汉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文化。

佛教何时传入新疆，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近几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也没有求得一致的见解，但是一般都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或差不多同时。印度阿育王是佛教的保护者与推行者，他曾派遣佛教徒弘传佛教，于是南自锡兰，北至中亚，东迄缅甸，都有佛教徒的踪迹。而《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有龟兹国名，如系真实的传说，则龟兹当阿输迦王时，已与印度开始了接触。但是，汉代有关西域的记载，却从未提

到新疆一带当时奉行佛教。新疆发掘的两汉遗址也不见有佛教寺院及有关遗迹,所以有人认为是东汉顺帝阳嘉、永和年间(132—141),中原地区困于羌乱,无暇顾及西域,笃信佛教的月氏势力由莎车、疏勒进入于阗,佛教的传入,也当在这时。此后,佛教渐次兴盛起来。佛教在西域传播的初期,经典的传译与寺院的兴建,促进了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佛教艺术也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在与内地频繁接触后,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进一步密切起来。从遗存的佛教艺术遗迹,仍然可以窥见一些当时佛教艺术的流传、演变概况。

二、于阗的佛教美术遗物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曾亲自到达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回来时谈到大宛以东的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3]这是我国史籍中最早有关于阗的记载。后张骞出使乌孙,曾遣副使去于阗。建武(25—56)以后,于阗等国也曾“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到东汉安帝时,班勇所记于阗已“领户三万三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于阗,在藏文《于阗国授记》中记载,于阗王瞿萨旦那十九岁时建国,即位为第一代王时,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四年。建国后一百六十五年,国王尉迟胜即位,治世五年,佛法兴起。^[4, 5]也就是说大约在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佛教已传入于阗。但是根据《后汉书·班超传》,永平十六年(73)班超作为汉司马被派到于阗的时候,因于阗受匈奴监护,国王待他非常疏慢,并且记载:“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驽马,急求取以饲我。’”说明当时主要流行于于阗的是“巫”,巫以马为牺牲,可能是祆教(拜火教)。

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出塞西至于阗的时候,在当地写得梵书正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晋太康三年(282),朱士行派遣弟子弗如檀(法饶)送梵本佛经到洛阳。太康七年(286)于阗沙门只多罗又持来《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梵本。而《华

[3] 《史记·大宛传》。

[4] 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上)

[J]. 中国藏学, 2012 (1) .

[5] 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下)

[J]. 中国藏学, 2014 (1) .

严经》梵本也是晋沙门支法领从于阗传来的。事实说明，佛教即使在东汉初年在于阗尚未兴盛，也当在此后不久就逐步得到发展，因此，到魏晋时期，于阗能成为向内地传播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从近年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也可以得到证实。

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以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发掘了一座东汉以后的木棺墓，墓中出土的蜡染棉织品下部边饰上有龙纹；中部虽已残缺，但从残留的人脚、狮爪和狮尾，仍然可以想见原书上人和狮子的关系；书的右下角是一完整的半身女像，头有项光，身后有背光，胸裸，佩璎珞，双手捧着下尖上圆的容器，器中满盛葡萄。这明显是接受了佛画影响的工艺品。白氍布（棉布）是当地的土产，画中有当地盛产的葡萄，边饰又有中原流行的龙纹，这一具有佛画影响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当地的产品。因此，画面上捧着葡萄的妇女像，是现实中信奉佛教的供养人的写照。此图说明东汉以后在精绝、于阗一带佛教已逐渐传播，从它也可了解到于阗一带早期宗教艺术的某些侧面。

《魏书·西域传》上还记得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



图2 蜡染菩萨像印花棉布

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关于赞摩寺，不论是《于阗国授记》，还是《惠生行纪》《大唐西域记》等书上，都记载了差不多相同的传说。惠生在北魏神龟二年（519）行经于阗时是这样记述这一传说的：“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缯，莫能审之。”

《大唐西域记》记此赞摩寺在王城南十余里，并且说毗卢旃来自迦湿弥罗。《水经注》卷二也记载：“城南十五里有刹利寺。”指的是同一个寺院，只是名称不同。以后诸史沿袭《魏书·西域传》作“城南五十里”。当以玄奘实际途经所记道里为准，“五十”盖为“十五”之误。僧人的记述皆取当地土俗旧闻，虽有相当多的传说成分，但赞摩大寺是于阗最早的佛教寺院，其中的佛像也是于阗最早出现的佛像，这尊像由于外国相传最似真相（《名僧传僧表传》），故凉州沙门僧表在公元5世纪西行停居于阗时，曾请求国王依样制作了高一丈的金箔像授予供养。此像曾运至蜀龙华寺。由此可见，于阗赞摩寺佛像在公元5世纪尚保存完好，它的像式据称可能来自迦湿弥罗。其传播法像的情形大致与《大唐西域记》中勃伽夷佛坐像、媲摩城佛立像的来源相同。很显然，于阗早期的佛像塑造与迦湿弥罗关系最为直接，这种传播痕迹在稍晚发现的拉瓦克寺院雕塑及丹丹乌里克寺院遗迹中仍能看到。

三、疏勒、龟兹的佛寺

疏勒、龟兹同为“丝路”北道上的大国，两国间声息相通，交往频繁。班固在《汉书》里开始记载这两国的疆域、人口、官制、兵备以及当地特产。据“疏勒国”条：“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又“龟兹国”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六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



图3 佛背光残片



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龟兹的领域在现在的库车、拜城一带，它的势力曾一度达到疏勒。东汉永平十六年（73），龟兹王建倚恃匈奴，攻破疏勒，杀其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后因汉军司马班超派兵驻守疏勒盘橐城，劫持兜题，龟兹的势力才稍受遏制。汉以后，附近的姑墨、温宿、尉头等国都臣属于龟兹。

疏勒、龟兹在汉代就开始与内地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宣帝时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宝夫妇到京城长安，宣帝赐给印绶，并且“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6]绛宝回龟兹以后，宫室制度都仿效汉室。他的儿子承德在成、哀帝时与内地往来也甚为亲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安远侯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所设在龟兹乌垒城。

自东汉永平十六年（73）以后，班超率军驻守西域，疏勒和龟兹保持了与汉朝的密切联系，永平十八年（75），班超与戊己校尉耿恭共击匈奴，稳定了西域局势。建初三年（78）以后，班超先后平定莎车、龟兹、焉耆。永元三年（91），班超任都护，迁居它乾城，立龟兹世子白霸为王。在汉魏之际，龟兹曾遭受莎车、匈奴先后兼并，到魏晋时期与内地往来又逐渐频繁。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使疏勒和龟兹文化上的一些成就，如音乐、佛学等方面的成就，迅速传入内地，而疏勒、龟兹文化也深深受到内地的影响。

疏勒、龟兹佛事兴盛较早。疏勒王臣槃，原为前王安国之舅，因罪徙月氏为质子，月氏王甚喜爱，为他在三地住处建伽蓝，冬夏迁居。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此事：“闻诸先志曰：昔犍陀罗国迦腻色伽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伽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犍陀罗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臣槃留月氏时已崇信佛教，回疏勒为王，可能成为最初在疏勒推行佛教的主力，疏勒的佛教当由此而逐渐流行。

[6]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东晋隆安四年(400),法显行经疏勒时,曾记述当地五年一次的佛教大会上四方沙门云集、王及群臣供养布施的盛况,说“其国中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而到玄奘行经疏勒时,伽蓝已达数百所,僧徒万余人。这种佛教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8世纪以后。

关于佛教传入龟兹的材料,汉译佛经中偶有涉及。《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记阿育王封给太子法益的国土中有龟兹国名。这部经的汉译本是由公元2世纪中叶的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所出,经中记录的传闻起源很早,曾流行于北印度一带。^[7]东晋太元四年(379),沙门僧纯从龟兹将《比丘尼戒本》带到长安,其中有“大法流此五百余年”的字句,按此上推,佛教传入龟兹则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前引《大唐西域记》及《杂宝藏经》有关迦腻色伽王接纳疏勒质子之事,为历史事件,较为可信。迦腻色伽是大月氏贵霜帝国推行佛教最得力的君主,在他将势力扩大到葱岭的同时,佛教随之传到了西域诸国。臣在月氏信佛,回国为王后,仍“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龟兹与疏勒交往频繁,信仰相同,龟兹初闻佛法,大致也在这个时期。

龟兹地区的佛教,在魏晋时期已相当发达,这从早期汉译佛经中龟兹沙门的情况可以窥其一斑。据《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所载,魏甘露三年(258),沙门白延由龟兹来到洛阳白马寺,译出大乘方等部《无量清静平等觉经》《首楞严经》及小乘《除炎患经》等数部;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竺法护在敦煌从龟兹副使关子侯得胡本《阿难越致遮经》;随后又有帛远(号法祖)等译出阿含部《佛般泥洹经》。这说明龟兹王族贵胄间诵习大小乘佛经已较为普遍。当时的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晋书·四夷传》)。龟兹不仅城内寺庙林立,而且王宫中也供设佛像。晋孝武帝时所出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记》说:“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

这些寺院规模都很大,僧尼人数达到几十人,以至170人。除了以上所记寺院外,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僧纯与昙充受佛图舌弥《比丘尼本戒本》及戒法是在云慕蓝。《释氏西域记》所记“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当是北山致隶蓝,“雀离”“致隶”盖为同名异译。上述记载至少说明在公元3世纪,龟兹佛事已具有了相当规模。

[7] 另有苻秦天竺三藏昙摩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



四、鄯善的佛教寺院

鄯善本名楼兰。张骞第一次奉使通西域时，始知有楼兰其国，这以后楼兰就开始了与内地的交往，因此也可以知道楼兰立国远在张骞出使（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26年）之前。关于鄯善的情况，《汉书·鄯善传》有这样的记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怪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做兵，与婼羌同。”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后，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十余辈”，屡经楼兰等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王恢率领轻骑攻楼兰，俘虏了楼兰王，以后楼兰开始又进一步与汉朝有着臣属关系。到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立尉屠耆为王，始改楼兰国为鄯善。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南齐书》等史籍上的有关记载，可以知道鄯善在汉及其后五六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鄯善国王被执，成为北魏的镇戍。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前，鄯善遭受丁零（高车）侵犯，人民散尽，城郭荒废。

鄯善佛教盛行。法显在弘始二年（400）行经鄯善时，当地约有八千余家，而崇信佛法的沙门多至四千余人。僧徒多悉小乘。“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8]从曾经发现的少数遗址，可以窥见鄯善寺院艺术的某些残余。鄯善国都泥在今若羌县（卡克里克）地区。在鄯善的另外一个重要城址伊循曾经有重要发现。伊循当时土地肥沃，为汉时屯田之所。据《汉书·鄯善传》，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鄯善尉迟屠耆王要求汉遣将屯田伊循。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就是在这一汉代开始经营的政治、军事要地，曾经发现有佛教寺院遗址，遗址中残留着零星的壁画与塑像。

在米兰地区一个唐代末年遗存下来的吐蕃旧堡东北一里半的地方，有一佛教寺院遗址（斯坦因将其定名为第2号遗址）。这一残毁的佛寺原来作长方形，外面围有厚壁。外壁和内室之间有很宽的走廊。中部原似为两层之建筑，中宽14米，深11米（第一层高2.7米），上层已残毁。原来的高度约2.4米，宽5.2米，深4.6米。第一层周

[8] 法显《佛国记·游天竺事》（又名《高僧法显传》）。

围有高 1.2 米、宽 0.6 米、深 2.4 米的佛龕一列。两龕之间都有浮雕的半圆柱，圆柱上部作卷涡形，下有双础。龕内有等身大的残塑数身。对着佛龕的外走廊，排列着 6 身跏趺坐大佛。佛头高 0.9 米（头均毁落地面），膝部宽约 2.1 米。在跏趺坐大像底部，曾发现一片梵文贝叶书。推测它的年代不会迟于公元 4 世纪。这是说明此处寺院建筑年代早于公元 4 世纪的线索之一。

就是在这吐蕃旧堡西一里左右，有另一寺院遗址（第 3 号遗址）。这一外方内圆的寺院建筑在一座 2.7 平方米的台基上，中部有直径 2.8 米的刹心（中心塔柱），原来顶部也作圆形。四周残壁高 1.2 米，四壁与刹心间的走道宽 1.5 米，入口处开有三窗，入口内壁装饰有极为精美的壁画，残留有翼天人像。东南壁下有壁画残片，画一着棕红色袈裟的释迦牟尼像，他的左侧有弟子 6 人，第一人手持菩提树叶。另外一块碎片上，画一王子合十坐于一大像前，人物有较明显的动态和神情，似为佛传故事的局部。

离第 3 号寺院遗址 20 米左右的第 5 号遗址中部为直径 3.4 米的圆形刹心，圆形过道围绕四周，壁画的配置与构图大体与上一寺院相同。外边方形过道的残壁上绘有同样的有翼天人，年代也大致相同。东面进门过道有壁画，在壁的下边有护板，壁画两身人像旁有佉卢文同梵文，可以知道是公元 4 世纪前的作品。西边对着入口处有一段弓形围已弄平，所余壁画向两旁伸展，分为两个半圆形。北壁上部只是少许壁画遗存，



图 4 米兰有翼天人

下部护板上的壁画已褪色，还可以辨识大体构图，与东南残壁护板的壁画一致，在一相连的宽幅波浪纹花饰带的上下是作各种形态的青年男女。有戴冠的王子，有持瓶的妇人，有携三弦琴的少女，有黑发的青年与勇猛的武士。东南残壁长约5米的壁画，上部是须达拏本生。须达拏是传说中的一个人乐善好施的王子，因为将国宝六牙白象施与了婆罗门，被其父王驱逐入山。须达拏入山，沿途仍不断施舍，将财宝、车马、衣服等舍尽，以后又将子女舍人为奴，后子女被转卖时，为祖父所赎，须达拏夫妇才被接回王宫。在壁上原来是画的全部故事，画面由右至左发展。残壁因壁体塌毁，起始部分已不明。中部为须达拏施白象与婆罗门。左方近门处为须达拏因施舍无节，为父王所逐，骑马别去。其前，马车上是妻及二子，北壁残画是王子夫妇隐居山林及回宫团圆等情节。在白象胛窝有佉卢文题记，记有作者 Tita 的名字。根据同时出土的文物以及美术品风格来推论，这些寺院是公元4世纪前的遗址。

须达拏本生故事画在新疆开始出现，所采取的形式不像龟兹等地公元四五世纪以后的作品，采用单幅构图，且运用连环画的形式。这说明本生故事壁画在中国流行时，一开始就可能有两种式样，一是单幅的，一是连续性的。须达拏本生故事画之所以值得重视，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早在公元4世纪以前的佛教艺术品就具有这样成熟的技巧，是十分惊人的。在画面上，不只人物、车骑、象马、树木等表现得很真实、生动，富有体积感；而且画家立意明确，着意捕捉人物相互间的关系，企图通过人物形态来准确地表现故事内容；同时也注意了利用环境、树木等的穿插，来区别而又联系起那些互相连续而又有所不同的事件发展过程。那些壁画上出现的人物，面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不同情节中几次出现的同一人物，面貌却画得非常准确，不必仔细端详，就能辨认出来。画面上的这些生动形象，以极为简洁的色彩和流利的线条表现出来，透露了艺术家熟练的技巧，以及对所表现的对象具有深刻的理解。须达拏本生故事画和另外一些作品，都说明新疆的佛教美术是在一个极其光辉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

五、龟兹石窟及其壁画

龟兹和疏勒佛教的兴盛，直接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过去曾经容纳上万僧徒的

寺院早已破败，今天仅能从残存的寺院遗址粗略了解当时佛教艺术的面貌。

疏勒境内的佛寺遗址，已发现的有脱库孜萨来古城佛寺。脱库孜萨来古城在巴楚县城北 75 千米的垒勒山上，山南北成行，中断为二，素为古来交通孔道。古城坐落在大道以北的山坡间，城南山岩下 1 千米处，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废墟，佛殿僧舍的布局规模仍清晰可辨。1959 年在古城内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北朝和盛唐的佛寺遗址各一处。北朝寺院仅残存两间僧房和一个夹道的墙基部分，房后天井有一个废弃的窖穴，出土有许多龟兹文木简、成堆的五铢钱和剪轮五铢钱。地面有许多泥塑佛像残块和小佛头，其中两个完整的小佛头为红泥模印，高 9 厘米，头顶有小型发髻，发作波状纹，面部额宽，形如鸡卵，细眉高鼻，低目小口，与新疆其他遗址出土的佛像相比较，形态古朴庄严，是当地早期的佛教艺术品。另有童子形石灰质范模一个，圆脸短发，发齐耳根，是制作佛像时所用的模具。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木雕坐佛，高 160 厘米，佛像头髻较大，直鼻深目，面形清秀，躯体健硕，全身仅在袈裟领口和下摆处稍刻衣褶，其余部分不加任何雕饰，整体感极强，其风格近似于印度抹菟罗佛像的造型特征。该馆藏品中另有一尊木雕的佛头像，头髻雕饰成螺状的卷发，面相丰圆，眉间白毫，广眉舒眼，鼻高唇薄，造型具有中亚人的特点。佛像雕成后漆成金色，以象征佛的金色身。这两件佛像均在新疆的巴楚出土，原物应是寺庙中的供设。

龟兹的佛寺遗存规模较大的有两处，一在库车西南约 25 千米处，寺院遗址坐落在渭干河东西两岸，俗称色乃当，分作东寺和西寺，沿河而上即为库木吐喇石窟。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及黄文弼等人的先后考察，在遗址内发现佛殿和寺塔建筑并采集到唐以前的器皿及佛像残片。

第二处是库车城北约 20 千米的苏巴什遗址，位于北山南麓，有铜厂河流贯其间，遗址即分布在河两岸的山坡台地上，称东西苏巴什。遗址中心有塔，周围环绕若干庙宇和佛窟。经考察和近年的发掘，得知河东有三塔，河西也有三塔，形成以塔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此外，在河西遗址南有一座古城，建筑布局仍以佛塔为中心，周围配以房屋建筑。根据建筑的规模和规格，黄文弼认为可能是龟兹国王到此受经听法时的所居之地。苏巴什遗址经试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东汉五铢钱及唐代铜钱、部分雕像残



图 5 佛头像

块和壁画残片。在伯希和剥走的苏巴什遗址壁画中有图像较完整的佛传故事画，题材和风格与克孜尔千佛洞第118窟的娱乐太子图相似，人物形象与表现技法具有典型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特征。苏巴什古城塔庙有重修过的痕迹，有的墙皮上下三层，表层的年代约为唐代，底层应为初建时的遗存。

龟兹国僧俗广信佛法，国内寺院林立。《晋书·四夷传》称：“龟兹国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国内著名的寺庙有王新僧伽蓝、北山致隶蓝、温宿王蓝、剑慕王蓝等八所。当时的龟兹，盛行小乘学，主要寺院都由小乘阿含学者佛图舌弥所统。大约在“声满葱左，誉宣河外”的鸠摩罗什由宾经沙勒归国后，佛教大乘学也开始在龟兹国传播，形成以小乘佛教为主兼行大乘佛教的局面。据《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拘夷国……有年少沙门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9] 龟兹佛教艺术的遗迹，除前文提到的苏巴什等佛寺遗址外，主要集中在石窟寺。石窟寺一般是依山傍岩，前临河流，平地起塔造寺，依崖开凿洞窟，形成以石窟为主体的寺院建筑群，以满足佛教僧人的修行需要。

[9]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图6 苏巴什佛寺遗址

龟兹石窟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库车和拜城两地。库车为古代龟兹的王城，在它的周围有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玛扎伯哈、森木塞姆；拜城有克孜尔、台台尔和温巴什等近十处。这些石窟融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在洞窟形制、绘画题材、艺术风格诸方面都反映出龟兹地区佛教艺术的独特面貌，其中开窟数量最多、壁画保存最丰富的又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为代表。

克孜尔石窟在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 10 千米的戈壁山崖下，南临木扎提河，与雀尔达格山隔岸相望。克孜尔，维吾尔语即红色，原意指泥沙俱下的红色河水，克孜尔石窟即因此而得名。克孜尔石窟已编号的洞窟有 236 个，洞窟罗列在东西约 1.5 千米的沙石山中。洞窟以苏格特沟为界，分为东西两区。沟东区包括后山的洞窟在内，有 110 多个；沟西区的洞窟有 120 余个。在苏格特沟西部第 10 窟山顶上，有寺庙遗址一处，在沟东区后山第 220 窟前也有一处寺庙遗址。在编号的 236 个洞窟中，有 75 个洞窟窟形完整，壁画保存较多。许多洞窟中有龟兹文题记，个别洞窟残存有塑像。

克孜尔石窟的形制，按其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供僧人起居的僧房，平面作方形，旁开甬道，通向崖外；一类是方形窟，窟顶大致有六重斗四形和穹隆形的变化，四壁不开龕，壁面及顶部多施彩绘；占克孜尔石窟重要位置的是分前后室、富于本地特色的长方形窟，共有 59 个。这种洞窟分前后室，前室为券顶，在前室之后结合刹心（中心柱）有间壁，把前后室分割开。间壁通道与中心柱形成可以环绕进行“右旋”仪式的通道。这种洞窟，从今天所了解的情况看，是龟兹特有的洞窟样式，可以称为“龟兹型窟”。

龟兹型窟，一方面符合佛教徒进行宗教仪式的要求（如“右旋”等），一方面又符合这里质地疏松的山岩的要求。中部有柱，使窟顶不易倒塌。窟内中心柱壁开龕塑像，后室奥壁起涅槃台，塑涅槃像，壁面满绘壁画，形成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龟兹型窟的另一种变化，是前室高敞、正壁雕塑大立佛的大像窟。据统计，克孜尔开凿的大像窟现存有 7 个，其中规模最大、开窟年代较早的有第 47、48 窟。以第 47 窟为例：其主室面宽 7.6 米，拱券高 18 米。从现存岩壁立佛凿孔观察，原像为泥塑，高度在 15 米以上。两侧壁有整齐的凿孔五排，据同类型的大像窟侧壁的布局安排，可知原来每壁有 5 列泥塑彩绘的佛像，下层为立佛塑像 7 身，以上 4 层为坐佛，均是 7 身。

第47窟大像两侧各有甬道与后室相通，甬道侧壁也各有菩萨塑像7身的残迹，甬道顶则画坐佛及天人。后室存涅槃台，台上原有大型佛涅槃塑像，现佛涅槃塑像已不存，壁面彩绘的身光由小立佛组成，举哀弟子的画像绘在佛的身光之外。第47窟雕塑和壁画的布局大体代表了龟兹大像窟的面貌。龟兹大像窟以大立佛为主尊，两侧塑十方佛，壁画亦多画佛像的格局，与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多画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的情形相比，题材内容上的差异极其明显。图像内容的不同，大概与龟兹佛教部派信仰之间的区别有关。按小乘佛教视释迦牟尼为教主，石窟寺院中集中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的前世和在世的种种事迹；大乘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因此在佛寺内大量塑绘十方佛和贤劫千佛。第47窟的 C_{14} 测定年代为 350 ± 60 ，与前述鸠摩罗什在龟兹宣扬大乘佛教的年代（359—385）正相符合，大像窟内塑绘的佛像，其相法图本或与鸠摩罗什弘宣大乘有直接关系。

龟兹地区的石窟群，一般都开凿有大像窟。在库车西南的库木吐喇石窟有四处大像窟，西北的克孜尔尕哈石窟也有四处大像窟，东北的森木塞姆石窟南北崖各有大像窟两处，这几处大像窟立佛高度均在10~15米。大约从公元4世纪以后，塑造大立佛已为龟兹地区所习见。当唐玄奘公元7世纪初越流沙，路经龟兹时，见龟兹国“大



图7 克孜尔石窟第47窟右甬道门道上方半圆端面坐佛